

青少年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的关系： 相对剥夺感及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

张 婷^{1,2}, 王彬宇¹, 叶理丛³, 张风华¹

(1.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昌 330022; 2. 江西省吉安市阳明中学, 吉安 343009; 3.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抚州 344000)

摘 要: 本文探讨青少年受欺凌后与人际适应性的关系, 以及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的作用。选取了青少年 871 名, 采用 Olweus 儿童欺凌问卷初中版的受欺凌分量表、青少年相对剥夺感量表、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青少年人际适应性量表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1) 受欺凌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2) 青少年受欺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和人际适应性两两之间均显著相关; (3) 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分别在青少年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效应值分别为 -0.05 、 -0.07 , 分别占总效应的 19.23%、26.92%; (4) 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 -0.16 , 占总效应的 61.54%。说明相对剥夺感与核心自我评价在青少年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关键词: 受欺凌; 相对剥夺感; 核心自我评价; 人际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5)02-0167-09

1 引言

英国伦敦大学专注研究学校欺凌的史密斯教授曾指出:“欺凌是一场沉默的噩梦”(Smith, 1991)。有研究发现, 中小学存在严重的欺凌问题, 大约 1/5 的小学和初中学生存在卷入欺凌和受欺凌问题(张文新, 2002)。很多遭受欺凌的青少年往往选择沉默忍受欺凌所带来的痛苦和屈辱, 而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张文新, 2006)。欺凌行为会严重影响受欺凌者, 受欺凌者不仅身体会受到伤害, 可能还会产生厌学的情绪, 出现逃学的行为, 更会损害受欺凌者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 受欺凌者上课注意力分散, 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可能还会抑郁、焦虑、失眠、做噩梦等, 极端情况下这些负面情绪还会使受欺凌者有自杀的想法(王美芳, 张文新, 2002; Herba et al., 2008; Olweus, 1993; Sharp et al., 2002)。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最早研究欺凌问题的是国外的 Olweus 教授, 他认为受欺凌是指儿童在一定时间内受到或反复遭受一个或多个儿童的消极行为(Olweus, 1994)。归纳众多学者对欺凌的分类, 主要有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这四种类型。关于欺凌, 性别差异化视角认为, 女生比男生具有较高的移情、情绪理解和观点采择能力, 女生所具有的女性特质和她们所认同的群体文化, 使得

女生更富有同情心, 更易为他人着想, 对人际关系和情感更为细腻敏感(Espelage et al., 2004)。而这也是为什么欺凌者大多是男生、男生欺凌发生率高于女生的原因(Chen et al., 2019; Olweus, 1993; Whitney & Smith, 1993)。因此, 相比女生, 男生可能更容易成为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其次, 在受欺凌发生率的生源地方面, 以往研究结果对此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研究发现受欺凌问题存在城乡差异, 城市受欺凌比例要高于农村学生, 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学生要更加富有同情和怜悯心(张文新, 2000)。但也有研究者发现, 农村生源地的学生比城镇学生更容易成为受欺负者, 这可能和个体成长的环境、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关(胡玉华, 2017)。在受欺凌发生率的年级差异方面, 随着年级的升高或者年龄的增长, 受欺凌发生率呈下降趋势, 但欺负他人的发生率在初中阶段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张文新, 2002)。有研究表明, 随着年龄和身体力量的发展, 个体会逐渐摆脱身体力量上的劣势, 从而减少受欺凌的发生几率, 而欺凌行为的发生则可能与人格特点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Whitney & Smith, 1993)。因此,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 提出假设 1: 受欺凌存在性别差异, 男生受欺凌发生率高于女生; 受欺凌存在生源和年级差异, 农村学生更容易受欺凌; 并且受欺凌发生率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呈

*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JY08)和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21ZD021)的资助。

通信作者: 张风华, E-mail: zhangfh@jxnu.edu.cn。

下降趋势。

有研究表明受欺凌和人际适应性存在关联 (Schwartz et al., 1993)。受欺凌者往往更容易被焦虑和抑郁所困扰, 缺乏人际吸引力是受欺凌者的一个特点, 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胆怯、行为退缩, 而这种行为退缩反过来又导致其人际交往更差, 更不为同伴喜欢。研究表明, 受欺凌者与回避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Payne & Hutzell, 2017; Schenk & Fremouw, 2012)。受到欺凌以后, 他们会表现出退缩行为, 对他人缺乏信任感, 不合群, 与他人交往会处于被动、胆怯的状态, 而这很可能会影响人际适应性。与此同时, 欺凌行为通过孤立、谣言破坏社会归属感, 归属感是个体最基本的需求。良好归属感的建立离不开人际交往。而人际适应性就是建立起良好人际关系的过程 (Toma, 2014)。人际适应性高的个体有较好的社交关系, 表现为亲社会行为, 心理健康状态较好, 自我认同较高, 能表现出积极的心态 (王东方等, 2019)。相反, 人际适应性低的个体较难与他人建立起亲密关系, 认为不被同伴理解与尊重, 容易与同伴疏远, 更容易有社交焦虑、抑郁和孤独感等负面情绪, 甚至还会有攻击行为 (王博晨, 金灿灿, 赵宝宝, 2020)。因此, 基于人际适应性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当前研究拟考察个体遭受特殊经历如受欺凌后对人际适应性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 个体的人际适应性与相对剥夺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相对剥夺感越强, 人际适应性越低 (熊猛等, 2021)。除此之外, 有研究表明受欺凌可以预测相对剥夺感, 受欺凌与相对剥夺感呈显著正相关 (高峰强等, 2017)。当前相对剥夺感 (relative deprivation, RD) 被广泛定义为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参照对象横向或纵向比较而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 进而体验到愤怒和不满等负性情绪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 (Xiong & Ye, 2016)。根据社会比较理论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SCT), 相对剥夺感的核心心理过程是社会比较 (Zhang et al., 2011), 向上比较可能会产生奋斗进取心, 也可能会有相对剥夺感的不满心理, 而向下比较则容易产生满足感 (郭星华, 2001)。个体在遭受到欺凌后会产生较多负面情绪如自卑、缺乏信任感等, 有研究发现自卑感较高的个体在与他人的比较过程中会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低一等, 自卑情绪剧增, 而这种带入自卑情绪与他人长期的比较中又会使相对剥夺感增强 (McLaughlin et al., 2012)。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越强, 在与周围其他人互动交往过程中就更容易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的地位, 导致内心充满愤怒和不满情绪, 对与他人建立温暖、友爱的关系造成困难 (熊猛等, 2021)。这就意味着相对剥夺感强的个体在

人际交往过程中会感觉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不如他人, 会对自己的人际交往产生负性情绪, 从而影响其人际适应性水平。因此提出假设 2: 相对剥夺感在青少年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Judge 等人首次提出核心自我评价 (core self-evaluations, CSE) 这一人格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 由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以及控制点四个基本特质组成, 这四个特质能够组合成一个潜在的、宽泛的结构 (Judge et al., 1998)。研究发现人际适应性与自尊之间存在相关 (Judge et al., 1998)。而自尊又是核心自我评价的因子之一, 因此,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测, 人际适应性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 有研究发现受欺凌者受到羞辱和敌意的对待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自我评价、焦虑和抑郁水平。受欺凌会使个体产生自卑感, 从而形成比较消极的自我概念, 使个体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降低 (Olweus, 1994)。根据 Eriksson 的发展理论,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自我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当感受到被排斥、被拒绝、缺乏对群体的归属感时, 他们的自尊心会下降 (Peng et al., 2019)。而自尊、情绪稳定性和自我效能感又是核心自我评价的三个重要组成因子 (Judge et al., 1998), 因此, 推测个体受欺凌后, 会影响核心自我评价。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对自己会持有较积极的评价, 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持认可态度, 为保持好在他人心中的形象, 在人际交往中会表现得尽可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接纳, 进而使得人际适应性水平最佳 (张晓州等, 2022)。相反, 核心自我评价低的个体对自己持消极的评价, 较难认可自己, 会倾向于追求自我保护, 在人际交往过程会表现出退缩回避行为, 不能很好地协调人际关系, 导致形成较低的人际适应性水平 (向燕辉等, 2021)。因此提出假设 3: 核心自我评价在青少年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 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是影响个体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 相对剥夺感可以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 (Hayes & Scharkow, 2013; Hobfoll et al., 2018)。社会比较理论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SCT) 指出比较是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的过程。个体产生较低自我评价是受到上行社会比较的原因 (Festinger, 1954)。而社会比较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核心心理过程 (Zhang et al., 2011)。一方面, 相对剥夺感是上行社会比较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USC) 的结果, 上行社会比较是导致个体低自我评价的关键因素, 易让个体认为自己受到了社会环境的不公正对待 (刘铁川等, 2021)。另一方面, 相对剥夺感会给个体带来愤怒、

不满等负性情绪,容易让个体产生挫折感,长时间处于消极的情境中,会引发个体对自我价值认可度的降低,进而形成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Nezlek & Kuppens, 2008; 张晓州等, 2022)。所以,相对剥夺感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密切相关,相对剥夺感越强,就越会加重个体的愤怒情绪和自卑感,降低自尊,进而影响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因此提出假设4: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在青少年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的关系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发展和校园欺凌事件高频发生的背景下,以青少年受欺凌为出发点,探讨其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人际适应性也是青少年阶段的重要概念,反映了个体在人际互动中为实现互动情境要求所提供的目标而进行的人际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契合(Oliver, 2012),并且有研究表明小学生受欺凌后59.9%的人告诉父母,48.6%的人告诉同学或者朋友。而中学生受到欺凌后,告诉父母的比例为36.1%,告诉同学或朋友的比例是63.4%(张文新, 2006),由此可见,中学生比小学生群体在朋友和同学上的社交需求更高。并且青少年与同伴的依恋关系质量高于父母的依恋关系(琚晓燕等, 2011)。因此,相对于小学生,初中生在和朋友和同学的相处中更需要建立起温暖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能力(Summerfeldt et al., 2006)。由此看来,中学生群体比小学生群体在受到欺凌后人际适应性的重要性表现更为重要。而目前研究中针对青少年受欺凌后与人际适应性关系的内在机制还不明确,对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经济领域,且多以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青少年的相对剥夺感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和自我发展的角度,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讨。在进一步丰富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关系研究的同时,帮助青少年缓解心理困扰,增强其人际适应性。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样本量估算:根据公式 $N = Z^2 [P(1 - P)] / E^2$ 估算样本量,其中 N 为样本量, Z 为 $\alpha = 0.05$ 时双侧检验的 Z 分数临界值, P 为概率值, E 为容许误差(Arya et al., 2012)。在本研究中, $Z = 1.96$, $E = 3\%$, $P = 14.9\%$,先前研究结果指出,中小学中,受欺凌的检出率为14.9%(张文新, 2002),得到样本量542。考虑到10%的无效问卷,因此最终需要样本量为597。

本研究选取了江西省两所城市学校(南昌市某中学、宜春市宜丰县某中学)和两所农村学校(樟树市某乡镇中学、宜春市铜鼓县某乡镇中学)。考虑

到青少年受欺凌发生的特点,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欺凌的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在初中阶段欺负他人的发生率具有稳定性。选取初一、初二、初三年级的学生作为被试。与此同时,考虑到高一年级的学生会面临新环境的适应以及建立新同伴关系问题,也将高一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初一185人,初二143人,初三109人,高一434人。男女比例均衡,男生428人,女生443人,生源地为农村625人,城镇246人,共发放93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59份(问卷设计中有一道测谎题,答错即为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871份,问卷回收率为95.93%。被试的年龄为12至17岁之间。

2.2 研究材料

2.2.1 Olweus 儿童欺凌问卷初中版的受欺凌分量表

采用张文新等修订的Olweus儿童欺凌问卷的中学版“关于直接受欺凌”分量表中测量受欺凌类型的六个题目(张文新,武建芬, 1999)。量表采用Likert 5计分,0表示“本学期没有发生过”、1表示“只发生过一两次”、2表示“一个月两三次”、3表示“大约一周一次”、4表示“一周好几次”。第一、六题用来测量言语欺凌,第二、四题用来测量关系欺凌,第三、五题用来测量身体欺凌。当被试在任意一个题上获得的得分大于或等于2(一个月两三次)时,就将其划分为遭受过欺凌的个体。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7。

2.2.2 青少年相对剥夺感量表

采用田云龙等人(2021)编制的青少年相对剥夺感量表,包含认知相对剥夺感与情感相对剥夺感两个维度,共10个项目,认知与情感相对剥夺感两个分量表各5个题目,分别包括青少年同伴关系、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兴趣发展机会、零花钱水平五个方面的不利地位所导致的认知和情感反应的水平。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算所有条目均分为最终得分。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2.2.3 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杜建政等人(2012)在Judge等人编制的CSES基础之上修订完成的单维度量表,由10个题目组成,其中第二、三、五、七、八、十题为反向计分题,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其中第八题“我觉得自己对事业上的成功没有把握”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在实习老师的指导下改为“我觉得自己对今后事业上的成功没有把握”,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

2.2.4 青少年人际适应性量表

采用周晖等(2008)编制,余益兵等(2012)修订的《青少年人际适应性量表》,包括亲社会倾向和人际疏离两个维度,由12个题目组成,所有题目均为正向,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71。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EpiData录入问卷收集的数据,采用SPSS2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材料均符合正态分布,计量材料用(平均数 \pm 标准差)表示。对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青少年各量表的得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Hayes开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6和回归分析进行链式中介分析,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水平进行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周浩,龙立容,2004),将受欺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和人际适应性四个量表的所有条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有6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首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32.51%(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2.4 研究结果

2.4.1 受欺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人际适应性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1)受欺凌在性别($t = 2.34, P < 0.05$)、生源地上($t = -2.56, P < 0.05$)均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男生的受欺凌得分显著

高于女生;在受欺凌类型方面,言语受欺凌和身体受欺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言语受欺凌和身体受欺凌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而在关系受欺凌方面,男女生不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学生受欺凌得分要显著高于城镇学生。在受欺凌类型方面,言语受欺凌在生源地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农村学生的言语受欺凌得分要显著高于城镇学生,而关系受欺凌和身体受欺凌在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2)核心自我评价在性别($t = 2.28, P < 0.05$)和生源地上差异显著($t = 2.17, P < 0.05$),男生要比女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得分更高;城镇学生得分要明显高于农村学生。(3)人际适应性在生源地上差异显著($t = 4.44, P < 0.001$),总体而言城镇学生的人际适应性得分要明显高于农村学生。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1)受欺凌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 = 4.64, P < 0.01$),多重比较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初一学生的受欺凌得分显著高于初三学生和高一学生;在受欺凌类型方面,其中言语受欺凌和身体受欺凌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关系受欺凌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初一学生言语受欺凌和关系受欺凌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学生,初一学生身体受欺凌得分显著高于初三学生。(2)核心自我评价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F = 2.89, P < 0.05$),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高一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学生。(3)人际适应性在年级上差异显著($F = 16.55, P < 0.01$),高一学生在人际适应性得分方面要明显高于初一、初二和初三学生。

综上所述,受欺凌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假设1成立。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青少年的各量表得分比较($\bar{x} \pm s$)

变量	例数	受欺凌	相对剥夺感	核心自我评价	人际适应性
性别					
男	428	0.52 \pm 0.66	2.52 \pm 0.81	3.26 \pm 0.84	3.13 \pm 0.48
女	443	0.43 \pm 0.53	2.48 \pm 0.73	3.14 \pm 0.67	3.18 \pm 0.44
t 值		2.34*	0.68	2.28*	-1.68
d		0.59		0.75	
生源地					
城镇	246	0.39 \pm 0.51	2.43 \pm 0.85	3.30 \pm 0.86	3.27 \pm 0.51
农村	625	0.51 \pm 0.62	2.53 \pm 0.73	3.16 \pm 0.72	3.11 \pm 0.43
t 值		-2.56*	-1.64	2.17*	4.44***
d		0.59		0.76	0.46
年级					
初一	185	0.61 \pm 0.66	2.53 \pm 0.70	3.08 \pm 0.76	3.04 \pm 0.37
初二	143	0.51 \pm 0.59	2.44 \pm 0.66	3.23 \pm 0.77	3.01 \pm 0.45
初三	109	0.42 \pm 0.44	2.63 \pm 0.73	3.11 \pm 0.71	3.13 \pm 0.37
高一	434	0.43 \pm 0.59	2.47 \pm 0.83	3.26 \pm 0.77	3.26 \pm 0.50
F 值		4.64**	1.58	2.89*	16.55***

续表 1

变量	例数	受欺凌	相对剥夺感	核心自我评价	人际适应性
η_p^2		0.02		0.01	0.05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	108	0.45 ± 0.65	2.46 ± 0.92	3.27 ± 0.88	3.19 ± 0.52
非独生	763	0.48 ± 0.59	2.50 ± 0.74	3.19 ± 0.74	3.15 ± 0.46
<i>t</i> 值		-0.43	-0.46	0.85	0.83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表 2 不同人口学特征青少年在受欺凌量表上的得分比较 ($\bar{x} \pm s$)

变量	例数	受欺凌	言语受欺凌	关系受欺凌	身体受欺凌
性别					
男	428	0.52 ± 0.66	0.81 ± 0.94	0.45 ± 0.77	0.32 ± 0.71
女	443	0.43 ± 0.53	0.66 ± 0.78	0.42 ± 0.63	0.21 ± 0.55
<i>t</i> 值		2.34 *	2.66 **	0.46	2.45 **
<i>d</i>		0.59	0.86		0.63
生源地					
城镇	246	0.39 ± 0.51	0.55 ± 0.75	0.41 ± 0.66	0.22 ± 0.53
农村	625	0.51 ± 0.62	0.80 ± 0.90	0.44 ± 0.72	0.28 ± 0.67
<i>t</i> 值		-2.56 *	-4.18 ***	-0.67	-1.30
<i>d</i>		0.59	0.86		
年级					
初一	185	0.61 ± 0.66	0.97 ± 0.98	0.53 ± 0.75	0.33 ± 0.68
初二	143	0.51 ± 0.59	0.78 ± 0.90	0.44 ± 0.64	0.31 ± 0.72
初三	109	0.42 ± 0.44	0.70 ± 0.81	0.39 ± 0.55	0.16 ± 0.42
高一	434	0.43 ± 0.59	0.62 ± 0.80	0.40 ± 0.73	0.25 ± 0.63
<i>F</i> 值		4.64 **	7.22 ***	1.49	2.01 *
η_p^2		0.02	0.02		0.01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	108	0.45 ± 0.65	0.64 ± 0.87	0.46 ± 0.81	0.26 ± 0.62
非独生	763	0.48 ± 0.59	0.75 ± 0.87	0.43 ± 0.69	0.26 ± 0.64
<i>t</i> 值		-0.43	-1.14	0.38	-0.08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2.4.2 受欺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与人际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 Person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受欺凌和相对剥夺感呈显著正相关($r = 0.49$, $P < 0.01$),与核心自我评价($r = -0.48$, $P < 0.01$)

和人际适应性呈显著负相关($r = -0.36$, $P < 0.01$);相对剥夺感与核心自我评价($r = -0.52$, $P < 0.01$)和人际适应性($r = -0.35$, $P < 0.01$)呈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人际适应性($r = 0.44$,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

表 3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bar{x} \pm s$	受欺凌	相对剥夺感	核心自我评价	人际适应性
受欺凌	0.48 ± 0.60	1	-	-	-
相对剥夺感	2.50 ± 0.77	0.49 **	1	-	-
核心自我评价	3.20 ± 0.76	-0.48 **	-0.52 **	1	-
人际适应性	3.16 ± 0.46	-0.36 **	-0.35 **	0.44 **	1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2.4.3 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在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检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在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将受欺凌作为自变量,将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将人际适应性

作为因变量。依次检验的结果如表 4 所示,受欺凌能够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beta = 0.49, t = 16.61, P < 0.001$);相对剥夺感能够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beta = -0.37, t = -11.72, P < 0.001$);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正向预测人际适应性($\beta = 0.30, t = 8.28, P < 0.001$)。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重复取样 5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设置 95% 置信区间,以受欺凌为自变量,人际适应性为因变量,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以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为控制变量,如表 5 所示。总间接效应值为 -0.16 ,占总效应的 61.54%,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2、3、4 成立。

具体来看,中介效应通过三条中介链产生:第一,由受欺凌→相对剥夺感→人际适应性组成的间接效应 1,其效应值为 -0.05 ,置信区间 $[-0.08, -0.02]$ 不包含 0,表明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显著;第二,由受欺凌→核心自我评价→人际适应性组成的间接效应 2,其效应值为 -0.07 ,置信区间 $[-0.10, -0.05]$ 不包含 0,表明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显著;第三,由受欺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人际适应性组成的间接效应 3,其效应值为 -0.04 ,置信区间 $[-0.06, -0.03]$ 不包含 0,表明相对剥夺感与核心自我评价在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青少年受欺凌作用于人际适应的具体路径如图 1 所示。

表 4 链式中介作用检验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人际适应性	受欺凌	0.36	0.13	127.62	-0.36	-11.30***
相对剥夺感	受欺凌	0.49	0.24	275.96	0.49	16.61***
核心自我评价	受欺凌	0.58	0.33	216.95	-0.29	-9.25***
	相对剥夺感				-0.37	-11.72***
人际适应性	受欺凌	0.48	0.23	84.84	-0.16	-4.43***
	相对剥夺感				-0.11	-2.98***
	核心自我评价				0.30	8.28***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表 5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26	0.02	-0.31	-0.21	
直接效应	-0.10	0.03	-0.15	-0.05	38.46%
间接效应 1	-0.05	0.02	-0.08	-0.02	19.23%
间接效应 2	-0.07	0.01	-0.10	-0.05	26.92%
间接效应 3	-0.04	0.01	-0.06	-0.03	15.38%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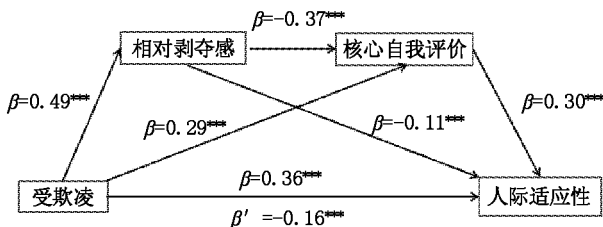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图

3 讨论

通过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欺凌的均分为 2.86 分(受欺凌比例为 52.8%),而在研究工具中指出只要被试在一个题目上的得分 ≥ 2 (一个月两三次),就被划分为受欺凌者,因此可以看出青少年受欺凌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和多位学者的研究一致,认为受欺凌是一种频发现象(张文新,2002;雷雳,

张雷,2002)。在性别上,青少年受欺凌差异显著。总体来看,男生受欺凌率要高于女生,这和国内外多位学者的研究一致,都表明男生欺凌发生率要高于女生(Olweus, 1993; Whitney & Smith, 1993; Slee & Rigby, 1999; 张文新,2000)。根据欺凌者的冷认知理论,男生具有更强的操控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能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来对他人实施不被老师发现的欺凌行为,但同时也更缺乏移情能力。同时,农村学生受欺凌率要高于城市学生,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胡玉华,2017)。农村较城市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且父母的文化程度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环境,家庭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欺凌发生率,相较城市学生,农村学生会更加自卑、胆怯和内向,这无疑会增加农村学生欺凌发生的几率。但和以往研究(张文新,2002)认为城市学生受欺凌

比例要高于农村学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和城市与农村样本差异量较大有关。在年级上,青少年受欺凌差异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中的“受欺凌的发生率会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研究结果一致(Olweus,1993;张文新,2002)。由多重比较结果可知,初一学生的受欺凌得分要明显高于初三和高一学生,在受欺凌类型方面,初一学生言语受欺凌和关系受欺凌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学生,初一学生身体受欺凌得分显著高于初三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初一学生相较其它年级的学生,在年龄上更小,比较懵懂年轻气盛,且初一学生面临一个新环境可能会出现许多心理上的不适应,而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自我情绪管理和调节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会采取更多暴力、言语上面的方式来解决,而相比初三和高一学生,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大和心理发展逐渐懂事成熟,他们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业上,会更加冷静理智地处理情绪问题,进而会降低欺凌发生率。因此学校和家庭要更加重视初一和初二学生的心理问题,教他们学会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初一初二学生的欺凌发生率。

同时,以上研究还发现人际适应性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在性别上,女生人际适应性得分要高于男生。这可能是因为男女性别差异,女生心思更加细腻敏感,更容易为他人着想,更通情达理,相较男生也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故而使女生在人际交往上的能力比男生更高,更会处理人际关系(Espelage et al.,2004)。第二,在生源地上,城镇学生的人际适应性要显著高于农村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学生拥有更好更先进的教育资源和较好的家庭条件支撑,同时父母可能也会更加重视孩子的成长,这会增加学生与人际之间的沟通了解,有利于提升城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相比之下,农村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和教育环境较差,人际适应方面会表现得更加胆怯、自卑。由此可见,社会、教育部门、学校和父母应引起重视,城乡差距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际适应性发展。第三,在年级上,高一学生的人际适应性显著高于初一、初二和初三学生。这和蔺秀云等人(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学生的人际适应性会随着年级的发展呈上升趋势,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级及年龄的增长,学生更加重视同伴关系,同伴地位也更加敏感,故而会更加珍惜与朋友的相处,更会处理人际关系,人际交往能力也会逐渐变强。因此,低年级的教师和父母可以更加重视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学生全面健全的人格。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受欺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与人际适应性之间相关显著。首先,本研究发现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Schwartz et al.,1993),表明受欺凌与人际适应性有关。同时有研究结果也表明受欺凌可以负向预测人际适应性(李海奎等,2012)。青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大部分学生的心理都是特别敏感脆弱的,尤其是在遭受负面事件如遭受欺凌后,学生可能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因此大部分学生可能会有自卑、抑郁、缺乏人际信任感等负向心理,这就导致受欺凌后的学生与同伴交往会表现的不信任、胆怯、不愿与他人沟通等,而这会使受欺凌后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变差,最后会影响学生的人际适应性。

其次,本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分别在青少年受欺凌对人际适应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链式中介效应。青少年受欺凌后往往具有较强的自卑感和愤怒情绪,个体特征体现为低自尊、低自我效能感和情绪不稳定性(谷传华,张文新,2003),而这些负向心理会使个体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长期的社会比较会加重相对剥夺感(McLaughlin et al.,2012)。研究发现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又会降低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导致核心自我评价降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Hayes & Scharkow,2013;Hobfoll et al.,2018)。青少年受欺凌后,高相对剥夺感和低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会使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处于被动交往、退缩回避的状态,不能很好的协调人际关系,最终会影响青少年的人际适应性。

最后,根据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SCT),相对剥夺感的核心心理过程是社会比较(Zhang et al.,2011),向上比较可能会产生奋斗进取心,也可能产生相对剥夺的不满心理,而向下比较则容易产生满足感(刘铁川等,2021)。研究结果启发我们为改善青少年受欺凌后的负性情绪,可以从社会比较和自我发展的角度出发,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社会比较观念,从而发现自身优势认可自我,有助于提高青少年受欺凌后的人际适应性和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回忆性的自我报告的问卷法,容易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和被试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且本研究取样来源于江西省四所中学,缺乏地方代表性,本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省份的学校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地域样本来证实。(2)本研究设计是横向研究,无法得出因果推断,因此未来可能还需要结合其他测量法如他人报告法和纵向设计来进行研究。

4 结论

(1) 青少年受欺凌、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和人际适应性两两之间均显著相关;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分别在青少年受欺凌对人际适应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相对剥夺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在青少年受欺凌对人际适应性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2) 受欺凌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受欺凌发生率高于女生,农村地区的学生相较于城市地区的学生而言,更容易遭受欺凌,欺凌发生率在年级和年龄逐渐增长的过程中有所下降。

参考文献

- 杜建政,张翔,赵燕.(2012).核心自我评价的结构验证及其量表修订.《心理研究》,5(3),54-60.
- 高峰强,耿靖宇,杨华勇,韩磊.(2017,3月).受欺负对偏执的影响:安全感和相对剥夺感的多重中介模型.《中国特殊教育》,(3),91-96.
- 谷传华,张文新.(2003).小学儿童欺负与人格倾向的关系.《心理学报》,35(1),101-105.
- 郭星华.(2001).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5(3),71-78.
- 胡玉华.(2017).职高学生父母冲突知觉对欺负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
- 琚晓燕,刘宣文,方晓义.(2011).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7(2).
- 雷雳,张雷.(2002).初中生受欺负状况的某些预测变量.《心理学探新》,22(1),38-43.
- 李海垒,张文新,于凤杰.(2012).青少年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8(1),77-82.
- 刘铁川,金小灵,赵玉.(2021).歧视知觉与贫困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相对剥夺感与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9(5),1036-1039,1044.
- 蔺秀云,方晓义,李辉,刘朝莹,杨志稳.(2006).云南省学生亲社会倾向发展趋势及对学校适应的预测.《心理发展与教育》,22(4),44-51.
- 田云龙,喻承甫,路红,贺雯,刘毅.(2021).青少年相对剥夺感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心理研究》,14(4),322-329.
- 王博晨,金灿灿,赵宝宝.(2020).青少年家庭功能、人际适应和网络欺凌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6(4),469-476.
- 王东方,刘彩丽,刘思瑛,王舒,孙梦,欧阳萱,杨新华.(2019).家庭功能对精神性体验的影响:人际适应和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7(6),1135-1138,1143.
- 王美芳,张文新.(2002).中小学中欺负者,受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的同伴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18(2),1-5.
- 向燕辉,袁蓉,赵佳旭.(2021).儿童期虐待与成年后孤独感的关系:反刍思维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44(1),191-198.
- 熊猛,刘若瑾,叶一舵.(2021).单亲家庭儿童相对剥夺感与心理适应的循环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心理学报》,53(1),67-80.
- 张文新,武建芬.(1999).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心理发展与教育》,15(2),8-12.
- 张文新.(2000).关注中小学的欺负问题上的教育.《心理发展与教育》,18(1),4-8.
- 张文新.(2002).中小学生对欺负/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心理学报》,34(4),387-394.
- 张文新.(2006).欺负行为的现状分析.《体育教学》,26(2),50.
- 张晓州,罗杰,彭婷,杨青松.(2022).大学新生相对剥夺感对人际适应性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效应.《信阳师范学院学报》,42(1),93-98,104.
-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12(6),942-950.
- 周晖,张豹,谭锐,黄鸣鹤.(2008).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的初步检验.《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6(9),1005-1007.
- 邹泓,余益兵,周晖,刘艳.(2012,1月).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评估的理论模型建构与验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65-72.
- Arya, R., Antonisamy, B., & Kumar, S. (2012). Sample size estimation in prevalence studies. *Indian J Pediatr*, 79(11), 1482-1488.
- Chen, L., Zhang, W., Ji, L., & Deater-Deckard, K. (2019).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relational aggression: Associations with changes in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90(6), 2153-2170.
- Espelage, D. L., Mebane, S. E., & Swearer, S. M. (2004). Gender differences in bullying: Moving beyond mean level differences. In *Bullying in American Schools*, 37-58.
-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
- Hayes, A. F., & Scharkow, M. (2013). The relative trustworthiness of inferential tests of the indirect effect in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Does method really mat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0), 1918-1927.
- Herba, C. M., Ferdinand, R. F., Stijnen, T., Veenstra, R., Oldehinkel, A. J., Ormel, J., & Verhulst, F. C. (2008).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the TRAILS study: Specific vulnerabilities of victim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8), 867-876.
- Hobfoll, S. E., Halbesleben, J., Neveu, J. P., & Westman, M. (2018).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The reality of resour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5, 103-128.
- Judge, T. A., Locke, E. A., Durham, C. C., & Kluger, A. N. (1998). Dispositional effects on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 role of core evalu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3(1), 17.
- McLaughlin, K. A., Costello, E. J., Leblanc, W., Sampson, N. A., & Kessler, R. C. (2012).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2(9), 1742 – 1750.
- Nezlek, J. B., & Kuppens, P. (2008). Regul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dail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6(3), 561 – 580.
- Oliver, T. C. (Eds.) (2012). *Applying a framework of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 for assessm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uelph.
- Olweus, D. (1994). Bullying at school: Long – term outcomes for the victims and an effective school – 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Aggressive Behavior: Current Perspectives*, 97 – 130.
- Olweus, D. (Eds.)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Oxford: Blackwell.
- Payne, A. A., & Hutzell, K. L. (2017). Old wine, new bottle? Comparing interpers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Youth & Society*, 49(8), 1149 – 1178.
- Peng, W. Y., Li, D. P., Li, D. L., Jia, J. C., Wang, Y. H., & Sun, W. Q. (2019). School disconnectedness and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Mediation by self – esteem and moderation b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mput. Hum. Behav.*, 98, 111 – 121.
- Schenk, A. M., & Fremouw, W. J. (2012). Prevalence,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coping of cyberbully victi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1(1), 21 – 37.
- Schwartz, D., Dodge, K. A., & Coie, J. D. (1993). The emergence of chronic peer victimization in boys' play groups. *Child Development*, 64(6), 1755 – 1772.
- Sharp, S., Smith, P. K., & Smith, P. (Eds.). (2002). *Tackling bullying in your school: A practical handbook for teachers*. Routledge.
- Slee, P. T., & Rigby, K. (1993). The relationship of Eysenck's personality factors and self – esteem to bully / victim behavior in Australian schoolboy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2), 371 – 373.
- Smith, P. K. (1991). The silent nightmare: bullying and victimisation in school peer groups. *The Psychologist*, 4(2), 243 – 248.
- Summerfeldt, L. J., Kloosterman, P. H., Antony, M. M., & Parker, J. D. (2006). Social anxie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8, 57 – 68.
- Toma, C. L. (2014). Towards conceptual convergence: An examination of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2(2), 155 – 178.
- Whitney, I., & Smith, P. K. (1993). A survey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bullying in junior/middle and secondary schools. *Educational Research*, 35(1), 3 – 25.
- Xiong, M., & Ye, Y. (2016).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 438.
- Zhang, S., Wang, E., & Chen, Y. (2011). Relative deprivation based on occupation: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f Chinese life satisfac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148 – 15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 in Adolesc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re Self – evaluation

Zhang Ting^{1,2}, Wang Binyu¹, Ye Licong³, Zhang Fenghua¹

(1.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2. Yangming Middle School, Ji'an City, Jiangxi Province, Ji'an 343009; 3. Fuzhou Medical College of Nanchang University, Fuzhou 344000)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 in adolescents, and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re self – evaluation. A total of 871 teenagers were selected. The Olweus bullying subscale,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re Self – 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Scale were used for the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student origin and grade; (2) Bully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core self – evaluation and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3)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re self – evaluation had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 of adolescents, with effect values of -0.05 and -0.07 , accounting for 19.23% and 26.92%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4)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re self – evaluation was -0.16 , accounting for 61.54% of the total effect.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re self – evaluation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bullying and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

Key word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core self – evaluation; interpersonal adaptability